

癸卯学制对现代教育的启发

□ 任九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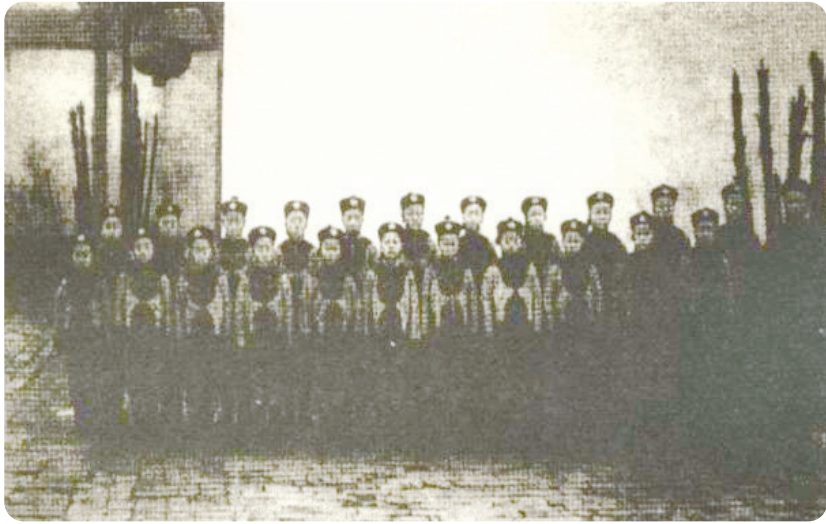
近代以来，经过各方考察和斟酌，1904年1月，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该章程成为第一个得到执行的系统的教育制度。这个《奏定学堂章程》里，系统规划了从小学到中学整体的教育制度。因为当年是“癸卯”年，又被称为癸卯学制。我们先看看小学（当时叫初等小学堂）的章程中有什么内容。

先进的教育理念

章程中写得很明白，“启其人生应有之知识，立其明伦理、爱国家之根基，并调护儿童身体，令其发育为宗旨；以识字之民日多为成效”。里面并没有诸如“赢在起跑线上”之类的内容。然而，这是不是现在很多人主张的“快乐教育”的指导思想呢？也不是，甚至区别很大。要求不高，不代表追求快乐。儿童时期的快乐，很多未必是真正的快乐。就像孩子爱吃糖，能从吃糖中得到快乐，但不能为了让孩子快乐就总给糖吃。

当时的小学一共八个科目，分别是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算术、历史、地理、格致、体操。其中，修身排在第一。修身的要义，在于“随时约束以和平之规矩，不令过苦”。就像设置一条无形的、弹性的规矩，用来约束小学生，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进行约束、引导。核心在于两点：一是约束；二是可以接受的范围。受约束总是不快乐。然而这种无形的约束，恰恰是在儿童时期形成规矩的重要条件，现代社会学上称之为“社会化”。过于放纵的所谓“快乐童年”，缺乏约束，哪能有规矩意识。

很多人认为，古代读书就是死记硬背。实际上并非如此，再看看当时规定是怎么要求的。“凡教授之法，以讲解为最要，讲解明则领悟易。所诵经书本应成诵，万一有记性过钝实不能背诵者，宜于试验时择紧要处令其讲解……若强责背诵，必伤脑力，不可不慎。”可见当时规定得多么详细，明确指出不能强行责令儿童背诵，以免损伤孩子脑力。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文件中还指出对于天生记性不好的孩子，可以用让学生自己讲解的办法，辅助记忆。所以说，认为古人学习就是强令死



湖北师范学堂附属小学的学生

记硬背，是一种误解。

很多读者也许会问，关于学习内容，晚清的学制有没有什么过人之处。这是个关键问题。其中一大特点便在于读经。小学时期读经的范围包括《孝经》《四书》《礼记》（《礼记》只是节选部分内容）。后人常以为古人学习就是死记硬背，大多是从古人读经的印象得来，这也是一种误解。从每天读经的数量上看，如果每年以240日计，小学一年级每日读40字，然后逐年增长，二年级增加到60字，三、四年级增加到100字，五年级增加到120字。论语开篇首句：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加上字符，刚好40个字。字不仅少，而且要求的是“成诵”。“诵”是诵读之诵，不是背诵之诵的意思，读出来就可以。这一篇短文正好是一日的读书量。

读经有整个体系设置，不仅是学生读，还要给学生讲。讲解上明确要求先讲大义，再逐个解释文字涵义。读经包括背诵，但不是单纯的死记硬背。对于记性不好的学生，可以“挑背”，即挑出重点内容进行背诵。此外，还有“回讲”，就是让学生自己讲解所读经典的涵义。自己上台向同学讲解这个环节，就涉及到学生的理解能力、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等综合层面。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很多有教学经历的人都有亲身体会，知道

自己上台讲，需要准备多少内容。准备的过程，就是最扎实的知识储备过程。如果自幼在学习中就坚持边学边讲，那么这些知识掌握得就会格外牢固。就此而言，虽然晚清时期学习的内容是自古以来的传统经典，但是在教学设计理念方面却是突破传统的。

重在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

通过这种学习传统经典的点滴进步，让当时的学生们在小学就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础，培养出了爱国精神和超强的学习能力。这种爱国精神使当时的精英带领民众最终渡过了民族的危机。这种超强的学习能力使得杰出的学生能够将这种学习能力用到自己日后从事的各种领域，从而迅速成长为各个领域的顶尖人才，引领各个领域的发展。

曾经有学者总结了一批新中国成立后作出巨大贡献的大师的特点，认为“这些中国的科学奇才有个共同的特点：在国内受了良好的教育，出国则师从当时世界上的顶尖人物。回国后，为国际大势所逼，民族急需，举国重视，在他们所从事的领域帮助落后的祖国跟上世界尖端，成就大国地位”。

较为典型的是著名科学家钱伟长先生。钱伟长出身书香门第，是国学大师钱穆的侄子。因父亲早逝，自幼

被钱穆抚养长大。大学之前，钱伟长受叔父影响，酷爱文史，几时在经史子集中打下了扎实的学习基础，锻炼出了超强的学习能力。然而，钱伟长因为对数理化和英语都不感兴趣，因而一直偏科严重。1931年考清华大学时，语文和历史钱伟长考了满分，但是物理考了5分，数学加化学考了20分，英语0分。因为语文、历史方面的出色成绩，钱伟长被清华大学历史系破格录取。但是，就在钱伟长刚到清华大学报到时，爆发了“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占中国东三省。听到这个消息后，为中国军事落后而愤懑不已的钱伟长拍案而起，表示：“我不读历史系了，我要学造飞机大炮。”钱伟长决定转学物理系，以振兴中国的军力。经不起钱伟长的软磨硬泡，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吴有训同意先让钱伟长在物理系试读一年。一年内物理和高数都能达到70分以上，才能正式转到物理系。在报国热情的激励下，凭借早年打下的扎实的学习基础，一年内钱伟长的物理和高数都达到了70分以上。此后，他又开始学习英语，到加拿大留学，取得多伦多大学博士学位。此后，钱伟长成长为力学专家，成为“中国力学之父”，为中国科学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与钱学森、钱三强并称为“三钱”。

在此并不是提倡钱伟长的偏科。应该看到的是，钱伟长自幼学习经史，积累了扎实的学习能力。这种学习能力，使得钱伟长能够转而在物理、数学、英语等方面的学习上同样取得优异成绩。钱伟长出生于1912年，正是属于受到晚清时期教育体系的影响、民国时期培养出的杰出人才。

在教育体系上讲求循序渐进、扎实学习，在内容上注意让学生在上学初期就学习凝聚了历史精华、经受了历史考验的经典作品，在方法上讲求学生的接受程度、注重进行诱导，在能力上综合培养学生的记忆能力、理解能力、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这其中蕴含的学习规律，难道不值得今人反思吗？



历史散叶

中国历史上，都城一般以“京”称之。“京”最初是一个地名，后来才用来指称国都、首都。这一点为现代语言学家杨伯峻所发现。他在所编著的《春秋左传注》中说：“京本周祖公刘所居之地名，《诗·大雅·公刘》‘笃公刘，于京斯依’是也。其后镐京、洛邑俱亦称京。”

公刘为周族历史上一位里程碑式的先祖。《史记·周本纪》说：“周后稷，名弃……弃为儿时，屹如巨人之心志。其游戏，好种树麻、菽，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法则之。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封弃于郤，号曰后稷……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刘立。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蓄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德。”

从这段记载来看，公刘为周祖后稷的四世孙。唐尧时，后稷担任农师，掌管农业生产，始封于郤（今陕西武功县一带）。后来，其子不窋由于夏太康政衰，失去农官之职，被迫西迁戎狄之间，改耕种为畜牧。唐代地理著作《括地志》称：“不窋故城在庆州弘化县南三里。即不窋在戎狄所居之城也。”弘化县为今甘肃庆阳。是时，周人主要在今甘肃北部一带活动。不窋之孙公刘恢复农耕，带领族人南渡渭水，迁回陕西，重新从事农业生产。周族从此开始振兴。后世作《公刘》以歌颂他的功绩。

“京”，初有二意。其一，从字义看，“京”为高地。

《公刘》第三章说：“乃陟南冈，乃覲于京。”第四章说：“于京斯依，踰险济济。”东汉经学家郑玄《《毛诗传》笺》（简称《郑笺》）说：“绝高为之京。”宋代理学家朱熹《诗经集传》注曰：“京，高丘也。”《诗·国风·定之方中》第二章云：“望楚与堂，景山与京。”《毛诗故训传》解释说：“京，高丘。”

据《新华字典》，“绝”为极端、非常；据《古代汉语词典》，“绝”也有独一无二之意。“绝高”意为非常高，也可理解为相对于周

「京」字源起

□ 李亚彬

围环境之最高。“丘”为土山，“高丘”为比较高的土山。这样看来，“京”意为高土山。

关于“丘”是如何形成的，清末经学家、训诂学家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说：“京者，《说文》：每‘人所为绝高丘也。’《释丘》：‘绝高为之京，非人为之丘也。’”这里，王先谦列出了两种意见：汉代经学家、文字学家许慎《说文解字》认为是人为堆砌而成的，《尔雅·释丘》则认为是天然形成的。无论持哪个观点，“京”为高地，是无疑的。

其二，作为地名，“京”为豳地的一个地方。

《诗·大雅·大明》第二章说：“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郑笺》说：“京，周国之地，小别名也。”清代学者俞樾《茶香室经说》卷四说：“京地在豳，《公刘》篇云：‘乃陟南冈，乃覲于京。’是即其地也。盖豳为大名，京是豳国之地小别名。公刘迁豳，实则居京。”可以说，豳为一地区，京为一地点，京在豳内。

综合以上二意，“京”为豳地的一个高地。周人回迁后，公刘居于此。周武王灭商后，定都镐，也称“镐京”。此后，“京”逐渐由一个地名演变为一个对都城的一般称呼。

从《颜氏家训》看中国传统政德

□ 尹传政



家训、家法是传统家庭教育中的主要内容，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古代家法中，最有名的当属南北朝时期的《颜氏家训》，它是由颜之推开“家训”之先河，编纂而成。颜之推，字介，生于江陵（今湖北江陵），祖籍琅琅临沂（今山东临沂）。他少年得志，十九岁便被任为国左常侍，但由于身处战乱纷争、朝廷更替频繁的南北朝时期，从而有着历任南梁、西魏等朝为仕，三为亡国之人的经历，这就决定了他有有着强烈实现国家治理的心愿，并寄托于后世身上，由此作书《颜氏家训》，“欲当好官，莫如正家”。

《颜氏家训》成书于隋文帝灭陈国以后，隋炀帝即位之前（约公元6世纪末）。共有七卷，二十篇。分别为序致、教子、兄弟、治家、风操、慕贤、勉学、名实、涉务、省事、止足、诫兵等。该书虽然是颜之推记述个人经历、思想、学识以告诫子孙的著作，但更多体现了在中国传统家

一体思想下，以通过个人修身、齐家所担负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情怀，因而，《颜氏家训》按照“治家之宽猛，亦犹国焉”的要求，将国家思想体现在治家理念之中，以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所以《颜氏家训》有着较多反映传统政德文化思想的内容。

勤学

勤学是中国传统官员必须具备的素质，所以《逊志斋集》就强调：“贤者由学以明，不贤者废学以昏。”由此可见，贤能的人只有通过不断学习才能将内心理念转化为符合道德规范的行为。这是因为通过学习能够提高自身修养，“学者，所以修性也。视听、言、貌、思，性所有也。学则正，否则邪”。同样，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勉学》中就强调：“自古明王圣帝，尤须勤学，况凡庶乎！”古代帝王都努力学习，况且我们这些平常人。

这是因为，一方面学习开发了心智，提高认识和行动的能力，“夫所以读书学问，本欲开心明目，利于行耳”。另一方面，读书学习使人更加身怀天下，“观古人之守职无侵，见危授命，不忘谏诫，以利社稷，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

自律

自律在中国传统政德文化中就是为官者严格要求自己。《尚书·伊训》就指出，“与人不求全，检身若不及。”这表示与人不求全责备，约束别人唯恐不及别人。对于约束和要求自己的态度则是，“律己宜带秋气，处世宜带春气”。《颜氏家训》指出了自律对人尤其对做官为人的重要性，强调：“自律：士而律身，固不可以不严也，然有官守者，则当严于士焉；有言责者，又当严于有官守者焉。盖执法之臣，将以纠奸绳恶，以肃中外，以正纪纲。”读书人要严格要求自己，尤其是在做了官以后，更要严于律己。靠道德规范，也要靠法律准绳。

节俭

注重节俭是古代政德文化对官员个人生活的基本要求。《墨子·辞过》

就强调：“俭节则倡，淫佚则亡。”可以说，节俭对家为国尤为重要，“一人知俭一家富，王者知俭则天下富”。

《颜氏家训·治家》篇中则强调持家要勤俭节约，批评那些奢侈和吝啬的行为，“孔子曰：‘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又云：‘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然则可俭而不可吝已。俭者，省约为礼之谓也；吝者，穷急不恤之谓也。今有施则吝，俭则吝；如能施不吝，俭而不吝。可矣。”颜之推提出：“如能施而不吝，俭而不吝，可矣。”这句话是指能够做到肯施舍而不奢侈，节俭而不吝啬，就可以了。同样，《颜氏家训》指出，如果保持朴素的生活作风，就必须善于节制欲望，才能知足常乐。在《颜氏家训·止足》篇中强调：“《礼》云，‘欲不可纵，志不可满。’宇宙可臻其极，情性不知其穷，唯在少欲知足，为立涯限尔。”

重义

重义轻利是当官为政者应该具备的态度和操守。张养浩在《三事忠告》中就指出了：“不竞：夫利之与义，势不并处，义亲则利疏，利近则义远。况为民师帅，而专务于利，其

聚怨纳侮，视市井小人不过也。故君子之从政也，宁公而贫，不私而富；宁让而损己，不竞而损人。”这里指为官者不能与民争利，不损人利己、不见利忘义，必须做到道义至上，以义为先，否则，为官者就不是“大人”“君子”，更没有“士君子”之道了。正是基于这种义利观，“从仕者，宜假此以行道也。道不行而富贵利达者，古人以为耻，而不以为荣”。所以，做官应凭靠道义而进，不以追求富贵利达为荣。《颜氏家训》也认为做官者要谨守正道、推崇德行，不要为了名利而不择手段，“君子当守道崇德，蓄价待时，爵禄不登，信由天命。须求趋竞，不顾羞惭，比较材能，尉量功伐，厉色扬声，东怨西怒”。通过不择手段获得名望与官职，这与偷盗食物来填饱肚皮，窃取衣服来求得温暖有什么区别？

务实

务实是传统政德所强调的官员必须专心致力于事务，做到办实事，以恪守自己的职责。《国语·晋语四》就认为：“华而不实，耻也。”官员只有讲求实际才能为人所信服，“实言、实行、实心，无不孚人之理”。只有办实事，才能堪当大任。《颜氏家训》也一

直注重务实的家教，从而培养后代具有务实的居官品德。《颜氏家训·涉务》就认为，君子立身处世，贵在能够对旁人有益处，不能只会高谈阔论，否则就会浪费国家资财，“士君子之处世，贵能有益于物耳，不徒高谈虚论，左琴右书，以费人君禄位也”。还必须将学习的知识用于实际事务，“吾见士中文学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诸掌，及有试用，多无所堪”。总之，为人处事只有脚踏实地，才能实至名归。对于官员来说，脚踏实地的做法就是在职位上尽职尽责。“国之用材，大较不过六事：一则朝廷之臣，取其鉴达治体，经纶博雅；二则文史之臣，取其著述宪章，不忘前古；三则军旅之臣，取其断绝有谋，强干习事；四则藩屏之臣，取其明练风俗，清白爱民；五则使命之臣，取其识变从宜，不辱君命；六则兴造之臣，取其程功节费，开略有术，此则皆勤学守行者所能辨也。人性有长短，岂责其美于六涂哉？但当皆晓指趣，能守一职，便无愧耳”。

